



【万家灯火】

文 道林

连俊，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朋友。笔者命题“连俊好福气”，似乎有点戳人家霉头。请读者听我把故事讲完，再看这个题目命得对不对？

连俊，1947年生人。儿时，因为父母多子女，工作忙，将他放在老家寄养。在乡下读完二年级后回上海又从一年级读起，比班上同学大了两岁。他1968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局第一技工学校，要不是多读两年小学他应该是1966届毕业生。这个“要不是”给他人生带来了许多“要不是”，要不是68届就不会去甘肃下乡，66届67届都是直接分配进工矿企业，也就不会出现那个让他致残的夜晚。唯独一个“要不是”，让他不幸中遇到“大幸”。要不是和同校同届的学妹杨月琴（后来的妻子）结伴去了甘肃省庆阳县赤城公社五星大队时家老庄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就没有他后来的婚姻。当年上海中专技校生下乡不落户，锻炼一年后进当地工矿企业工作。悲催的是连俊还没等到一年期满，人生出现大逆转。

五十一年后，连俊兄跟笔者说，要不是陇东的地下窑洞，他也不会掉下地坑。陕北的窑洞是在山坡脚下开凿，陇东窑洞是平地向下挖出一个四方大坑，有斜坡进入地坑。窑洞就开凿在坑壁里，大坑距离地面有十多米高度。1970年2月的那个夜晚，连俊和集体户的另外两个男生在队友两位女生（其中一个杨月琴）住处吃罢晚饭返回自己窑洞。听到远处传来狼嚎的声音，连俊循着声音方向去搜寻。大雪覆盖的地貌加上天黑，没有标识物辨别，连俊一脚踩空，仰面摔入地坑。颈椎骨被凸起的锥形冻土击碎，瞬间昏厥。同学和老乡中没有人懂抢救常识，把他背起来往坑外走，而不是找一块门板让患者平躺，致使碎骨刺破中枢神经。送到庆阳地区人民医院已是第二天凌晨。20天后，连俊被转送至上海华山医院治疗。这一住竟是三年有余。1973年的4月，身高1.78米的彪形大汉连俊只能撑着学步车勉强走上几步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连俊回沪治疗八个月，也就是这批上海中专技校生下乡一年后，获得分配工作机会。杨月琴被分配至兰州纺织总厂当上了一名挡车工，融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渐渐有热心人给小杨姑娘介绍对象了，此刻的杨月琴芳龄22岁。热心人的介绍无一例外遭到杨月琴的婉拒。人们疑惑、猜测，终于从小杨的上海同学口中探得真情，小杨有对象，还是一个截瘫的残疾人。人们的表情很复杂，惊讶、钦佩、惋惜……

笔者曾自以为是她猜测，杨月琴和连俊兄喜结连理，娘家这一关不好过。和杨月琴交谈后，发现自己真是“小人之心”。杨月琴说，母亲当着女儿和准女婿连俊的面说：“旧社会做人要讲良心，新社会做人要讲道德，月琴啊，假设摔坏的是你，我相信连俊也不会不管你。”多么善良的杨家人啊！当连俊转送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后，准岳父隔三差五地往病房送营养菜。准岳父家住南市老城厢，上班在人民路上的粮店。利用中午一小时的午餐时

## 家父从老区带到上海的红书

文 杜晓建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今年“读书日”在福州路上海书城举办的《寻找红色记忆，传承百年荣光——暨百份红色记忆展》上，我送展的藏品《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土地问题》一书的图片展出。这是1949年3月，家父离开山东根据地，随军南下准备接管上海时，随身带到上海的本小册子之一。

家父离世后，我在他的书柜中发现这6本泛黄发脆的山东革命根据地旧书，内页里父亲还写下“此书是南下时从老区带来的”。盖着他的藏书章。我后来在这6本书上添盖了我的收藏印。

1948年，家父随军南下一路征战，接管上海在沪扎根。“文革”浩劫忍辱负重，改革开放安享晚年，这6本书始终陪伴着主人，是什么力量让他把这6本书带到上海？陪伴他到生命的终点！

## 连俊好福气

间，骑上半小时自行车赶到乌鲁木齐路上的华山医院，送完菜赶回粮店再上班。

在杨月琴鸿雁捐书的抚慰下，连俊从绝望、焦躁、苦闷的心境中走了出来，开始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出院后的连俊只能回到父母处。连俊回忆那些年唯一的盼头是兰州来信，杨月琴的书信成了连俊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连俊要给杨月琴回信，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他的十指已经失去功能，拿筷子都不听使唤，要捏住钢笔写信，太难了。心中有了念想，就会产生动力。连俊进行手指康复训练，渐渐可以勉强握住钢笔，但写出来的字实在是难看。杨月琴从这难看的字体中看到了希望，未婚夫的精神已经站立起来了。

1978年，劫后重生的连俊和同窗杨月琴领证结婚，第二年诞下一个男孩。鉴于这户家庭的特殊情况，上海、兰州两地民政、劳动部门伸出援手，办妥了杨月琴的调动手续。1979年底，杨月琴被安排在离家不远的凯旋路上的上海台布厂上班。此刻三口之家和公公婆婆挤在天山二村的一间房间里，无疑是特困户。房管所增配了半间房子，一室户变成一室半。熬到1982年，房管所再度照顾，分配给杨月琴一间15.6平方米的单独住房，厨卫是和另一户人家共用。杨月琴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总算有了自己的“窝”。

问及杨月琴：“那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像打仗”回答形象而精准。

杨月琴每天五点钟起床，好在菜场就在马路对面。买完菜抓紧做早饭，催儿子起床，帮助丈夫穿衣、如厕、淋浴。然后再煮饭烧菜，这是准备丈夫和儿子的午餐。弄完这些，来得及就草草吃口早饭，来不及就奔出家门去上班。从居住的天山小区（老四村）到厂里快速步行20分钟，如果遇上武夷路铁路道口关栅栏，那就惨了，上班必定迟到。那年月，迟到了要扣奖金的。就是这般打仗一样的紧张，也没影响杨月琴的进步。她从生产一线操作工进入工厂管理层，在销售科做统计员，并加入了党组织。

俗话说，寒门出孝子。儿子在上幼儿园时，婆婆家娘家人帮着杨月琴拉扯。等到儿子连晏杰读小学三年级时，中午父亲的那顿饭由儿子包办了。儿子小学在天山二小，初中在娄山中学，均离家五百米。别人家孩子在学校就餐，小晏杰不能，他要赶回去帮父亲热饭菜。当时还没有微波炉，上灶加热要打开煤气。擦了火柴打开煤气，还没伸到出火孔，火柴燃尽，有时还烧烫了小手，弄得孩子手忙脚乱。就这样小晏杰为父亲奔波在学校和家之间整整六年，却没影响他学习成绩，稳稳的“学霸”。直到高中考取延安中学（延安西路汪家弄）来不及来回奔波才作罢。

杨月琴回忆说，当时没有专门帮助截瘫病人翻身的设备，每天夜里她要帮助丈夫翻身，她的生物钟就像定了时的闹钟，到点就响。换言之，杨月琴这大半辈子没睡过圆觉。所以，平时，只要倒头就能呼呼大睡。这样的艰辛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支撑力，是做不

到底的。杨月琴一个弱女子表现出的“强大”让身边人肃然起敬。当丈夫连俊走出心理阴霾，参加社会活动后，她又多了许多事。丈夫发起成立了天山路街道残疾人读书会，外出开会时她要推轮椅全程陪同。丈夫要写发言稿或发表文章，在电脑没普及时，杨月琴还要在夜深人静时帮着誊写。连俊30多年来发表各类文章400余篇70余万字，在电脑没普及之前都是杨月琴帮助誊写的。有电脑了，她先学会，再教会丈夫使用。连俊戏称自己的电脑操作是“一指禅”，两只手中各有一根手指指可以用“一点力”，所以他在电脑上写字，就是靠两根“一指”戳戳捣捣。

1996年，上海纺织系统全员下岗，时年杨月琴才47岁。她反而感到轻松了，再也不要像“打仗”一样奔波了。她应聘来到家门口的天山居委会当了一名聘任制的居委干部。照顾丈夫、居委工作两不误。薪酬不高，但很满足。她的社区工作屡受表扬，被评为社区优秀共产党员。后两年被街道司法所聘去当了人民调解员。这一干，整十年。

杨月琴和连俊的事迹受到地方乃至中央的表彰。1983年，杨月琴家庭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五好家庭”；1997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16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书香之家”。

长期超负荷的体力付出，杨月琴身体感觉力不从心了。这个节骨眼上，儿子撑起了这个家。2002年，儿子连晏杰从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并保送进入复旦研究生院读硕士。儿子却毅然决然放弃读研，直接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后贷款买下三房两厅的商品房（期房）。他对父母说，读研我会读的，以后可以在职读，当务之急必须改变我家蜗居状况，让二老有一个舒适的晚年生活环境。2006年杨月琴也退休了，带着丈夫搬离了居住24年的那一间老公房，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又过几年，儿子结婚成家，新房买在和父母一路之隔的小区，通常所说的“一碗汤”距离。

原本可以站立的连俊，在1998年的一次痔疮手术后不能站立了。这对于进入晚年的杨月琴而言，服侍变得更加吃力。2010年的一天，她又着丈夫的胳膊窝要把他拖上床时，右眼突然失明，原来是用力过猛，致使眼血管爆裂，视网膜脱落。儿子当机立断请了住家保姆，专门服侍父亲，让妈妈得以解脱重体力活。如果凭着杨月琴和丈夫连俊的养老金收入，是无论如何请不起住家保姆的。因为，有了儿子这个坚实后盾，老俩口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的连俊只要是天晴，就会在保姆陪伴下，坐着轮椅进入小区边上的吴淞江外滩（连俊起的名字）亲水平台上，转车轮练臂力，晒太阳深呼吸。灵感一来，“一指禅”戳电脑键盘写文章。看连俊的气色，面红堂堂。而妻子杨月琴则是满头银丝，有些苍老。

回到文章开头的设问，笔者自以为为命题应该是准确的。杨月琴和连俊的故事让笔者想起一句名言：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我想改动一下：一个重残人幸福生活的背后必定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2018年5月9日的《天山社区晨报》刊载了我拍卖家父藏书的故事。2014年香港拍卖的书和2021年上海展出的书，主题竟然是6本书中的天然巧合，都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专著。而父亲离山东根据地以后，从接管上海到离开人世，与上海农村结下了生命情缘。他的履历里也是写满共产党关于土地和农民的印记。

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庆贺之际，录下陪伴家父一生的老区红书故事，祝愿子孙后代永葆这红色江山的传承活力！

【人生履痕】

## 代填“入党志愿书”

文 余国放

大哥生前是重庆国际旅游公司的工会副主席，写得一手俊秀的硬笔字，可他的“入党志愿书”，竟是我这个远在上海的弟弟为其代笔填写。说来话长——

2001年春节前夕，大哥在重庆一家医院切除右颈部一粒硬质物，本以为是外科小手术，没想到经病理活检竟是鼻癌。到了2002年5月，大哥肿瘤已转移，下肢瘫痪，住进了重症病房。我和姐姐妹妹得知后匆匆赶往重庆探望。当晚住在大哥家中，我意外地发现书桌上有一份空白的“入党志愿书”，旁边是大哥向党组织写的厚厚一叠思想汇报。我知道大哥这十几年来一直在积极争取入党，但不知何故一直没能如愿。这份迟来的“入党志愿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忙问大嫂，大嫂说，这是前不久发下来的，你大哥还没来得及填写就住进了医院。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大哥任职的公司，党委副书记和所在支部的一位女书记接待了我。我直奔主题：“我大哥争取入党已经十几年了，这次组织上又发给我大哥入党志愿书，不知能如愿吗？”

这位女支书面露难色，说道：“至今还有些不同意见”。我强忍悲痛哽咽道：“我大哥一直努力工作，多次获得先进称号，他用实际行动积极争取入党，他究竟什么地方不符合党员标准？”女支书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默默流泪。我接着说：“医生说我大哥最多还能活三个月，我已无法填写入党志愿书了，我是他的亲弟弟，他在上海工作，有着十几年党龄，我能否代他填写？”两位书记用目光交流了一下，破例同意了我的这一请求。

当天中午，我将两位书记同意代填入党志愿书的事告诉大哥，大哥沉思良久说：“放弟，填写入党志愿书是件非常严肃的事，还是等我做好了再填写吧。”

我没有和大哥争执，心想，我不能依着您的意愿了。当晚我含着热泪，在大哥的桌面上，用大哥常用的钢笔，工工整整填好了这份非同寻常的“入党志愿书”。翌日上午，我把填好的志愿书交到大哥手中，他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并从病床上艰难地坐起身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日期。

大哥一生追求进步，早在天山中学读高中时就要求加入共青团，就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一直没有得到批准。毕业后在天山街道待业一年后进入上海合成纤维厂工作，进单位后他又写了入党申请书。在担任厂工会宣传委员时，他半天可把全厂七块黑板报全部出完，殊不知他的出众才华引起身边别人羡慕妒忌恨，入团屡屡受阻。1966年大哥支援内地建设去了重庆。后调到重庆国际旅游公司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很快从科员升职为科长，又担任公司工会主席（副处级），在这期间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大哥血液里有着父亲正直率真的遗传因子，作为分房领导小组成员的他，曾对公司某些领导在分房中的不正之风提过意见，得罪了个别领导，造成不进党组织“门”的结果。但是大哥要求入党的信念始终不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我父亲政治上获得彻底平反，全家再也不受成份不好的影响。大哥要求入党的愿望愈发强烈，更为在国安部门工作，年仅25岁却有5年党龄的儿子感到骄傲。

当大哥查出癌症后，所在公司正处在机构改革的关键时刻，大哥放不下工作，一边在医院放疗、化疗，一边与班子成员研究制定改革方案。还拖着病体为其分管的科室讨回上百万元的应收款，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到了后阶段，大哥上下班已无法爬上几十级台阶的公司办公大楼，上下班是公司的同事硬把他搀扶上去的。大哥一直工作到他下肢瘫痪卧床不起为止。大哥是在用他的热血，用他的生命填写那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啊！

2002年6月14日，大哥公司所在部门党支部在大哥的病床边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同意我大哥为中共预备党员，不久公司党委正式批准。同年9月13日上午9点30分，大哥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年仅57岁。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录下胞兄争取入党的故事，以志纪念。